黄负生: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宣传家

黄负生画像

1922年2月,为了揭露军阀赵恒惕惨杀湖南早期工人领袖黄爱、庞人铨的罪行,在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途中,毛泽东停驻黄土坡中共武汉区委机关,并多次探望卧病在床的黄负生。在与黄负生交谈中,毛泽东称赞:“湖南有个蔡和森,湖北有个黄负生。”蔡和森是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、宣传家,湖南学联机关刊物《湘江评论》的主持人之一,毛泽东将黄负生与蔡和森相提并论,可见对黄负生革命理论宣传工作的高度肯定。

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:提倡新家庭观和新教育观

新文化运动时期,从迷茫中醒悟的黄负生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,积极阅读《新青年》《共产党》等进步刊物,创办了《道枢》《互助》等先进期刊,是武昌中华大学校刊《光华学报》以及武汉学联《学生周刊》的主要撰稿人。黄负生是党的一大召开前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,党成立后担任武汉区委宣传委员兼党刊《武汉星期评论》的主编。黄负生反对封建思想,倡导新观念,尤其从改造社会和改造教育入手,倡导教育公平,妇女解放,提倡新的家庭观和教育观。

1916年,黄负生在《妇女杂志》发表了用改良的文言文撰写的《余意中之新家庭》,抨击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禁锢妇女自由的封建礼教,主张社会分工明确,男女平等,倡导建立“以老幼男女,分工任事,各出所得,公之于众”的有序社会。与此同时,黄负生还十分痛恨当时腐败的教育制度,主张教育改革。随后,黄负生还代表《武汉星期评论》社,致信青年读者,指出:“教育前途,黑暗万丈”,勉励青年为教育改革努力奋斗,“宁可为真理的牺牲者,不可为强力的征服者”,推动地方教育整顿和教育革新。

封建制度的批判者:关注群众疾苦,揭露军阀本质

黄负生年幼时父亲早逝,家道中落,靠母亲针线纺织和亲友的救济得以上学读书。由于亲身经历过清苦生活,使他对豺狼当道、民穷财尽的社会状况甚为不满。他忧国忧民,体恤人民疾苦,十分关切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,注重批判封建社会的剥削和压迫制度,尤其对封建社会的没落和强权政治的黑暗十分痛恨。

在新思想的冲击下,黄负生发表了大量揭露社会底层民众惨淡生活的文章,如1916年发表的小说《孤儿》,1921年发表的散文小说《和平之死》以及诗歌《湘鄂战争》等,通过运用不同的文体,描述了社会不同底层人群,包括孤儿、老人、鞋匠、士兵、奴隶等弱者的悲惨命运,揭露了军阀混战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,表达了对军阀阶级压迫剥削制度的痛恨。黄负生认为要改变社会现状,必须揭露封建军阀的虚伪面目,打破民众对军阀统治的幻想。

工人自己的宣传家:讴歌劳工神圣,领导工人运动

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,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途径。黄负生一方面十分关注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,另一方面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,积极推动和领导工人运动,是武汉地区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重要启蒙者。

为了唤醒民众的觉悟,扩大社会的同情和支持,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,黄负生如实报道工人的生存现状,领导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。五四运动爆发后,黄负生在《学生周刊》上用白话文进行宣传工作,与恽代英等人在汉口阅马场召集会议,号召工人、商人、学生开展罢工、罢市、罢课运动。1920年,黄负生着手研究汉口地区码头劳动工人的生活状况,与刘子通、陈潭秋在《新青年》合发《汉口苦力状况》一文,发出了“汉口劳动界之最苦者,莫苦于驮货一类”“彼等所受之苦痛,实人生之最难堪者”的感慨。1921年5月,汉口租界发生人力车工人罢工运动,黄负生热情接待工人代表,了解工人诉求和罢工斗争的开展,总结罢工斗争经验并如实报道工人罢工情况,推动了罢工运动的发展。为了更好地领导工人运动,黄负生积极推动成立工人运动领导机关。10月,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,黄负生积极参与分部工作,领导工人运动,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

正当黄负生不辞辛苦、激情昂扬地奋战在党的革命战线之际,却因拒不交出揭露中华大学政治黑暗面的文章原稿和作者信息,被强权势力威逼利诱并施以暴力,致其肺痨加重,于1922年4月7日不幸逝世。纵观黄负生革命生涯,尽管短暂,但他为新文化运动、马克思主义的早期宣传以及工人、学生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□兖芳芳

人物春秋

文人与金华火腿

往 事

闲来无事,驱车往山里行,路过金华北山脚下,几户农家正利用晴好的冬日自行腌制火腿。一时好奇下车去看。见主人正在处理一只肉质细嫩的猪后腿,抓起一大把一大把的盐往猪后腿上抹。我笑着说:“你家孩子有口福。”主人也开心:“今天天气好,抓紧腌起来。”不一会儿,他把抹好食盐的鲜腿放进一只大缸里,上面用几块大石头压实。主人告诉我,一两天后取出,在火腿上面敷上适当的食盐,再腌一个月,然后将猪腿取出晾晒,等腌制的猪腿变得油光发亮、色泽红润,就可食用了。我看见旁侧屋檐下有早先腌好的猪腿悬挂着,日光已经晒透了肉味,走近就能闻到扑鼻的香气。

中午在山上吃饭,忍不住就点了一盘火腿炒冬笋,火腿切片后肉色显玫瑰红,红白分明,油而不腻,搭配刚从竹林里挖出的脆嫩冬笋,非常下饭。

事实上,上世纪30年代,金华北山也走来一个年轻人,他不是冲着火腿来的,但他却把整个北山比作一只“大火腿”。他说:“北山的名字,早就在我的脑里萦绕得很熟,尤其是当读《宋学师承》及《学案》诸书的时候,遥想北山幽景,料它一定是能合我们这些不通世故的蛀书虫口味的。”所以尽管山路崎岖,但年轻人的兴致丝毫不为所减。游罢北山,北山管理委员会招待这个年轻人吃金华火腿,年轻人极为高兴。他风趣地说,长三百余里,雄镇北郊的金华北山,就是天赐的“大火腿”,够几辈子享受了。这个年轻人就是著名小说家郁达夫。据说,后来他流亡到东南亚,最爱吃的还是来自浙江老家的金华火腿。

提到金华,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并不是什么历代名家,也不是什么风景名胜,他们的脑子里很顽固地驻守着一只火腿。出差在外,别人问我你从哪来,我说金华。他们说不知道。我再说,就是出火腿的地方,他们马上恍然大悟地说,原来是出火腿的地方啊,那我知道。

火腿就像一个琵琶形的红润印章,深深地烙在金华这片土地上,成为一个独特的地理象征。

据史料考证,金华火腿始于唐,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。唐开元年间,陈藏器在《本草拾遗》中说:“火骱(tui,据《康熙字典》,骱、腿通用),产金华者佳。”而民间传说中的金华火腿的由来,则与宋代抗金名将宗泽有关。话说义乌人宗泽从抗金前线回到家乡,经常买些猪肉请乡亲们腌制起来,带出去馈赠亲友和自己的部下。这种腌制后的猪肉,将士们吃了赞不绝口。据说宗泽曾挑选了一批特别好的献给朝廷,宋高宗赵构见此肉色泽鲜红似火,就命名为“火腿”。明朝诗人张岱曾为金华火腿作过一首诗:“至味惟猪肉,金华早得名。珊瑚同肉软,琥珀并脂明。味在淡中取,香从烟里生。腥膻气味尽,堪配雪芽清。”

由于所用原料和加工季节、腌制方法的不同,金华火腿有许多不同的品种。在隆冬季节腌制的,叫正冬腿;将腿修成月牙形的,叫月腿;用前腿加工,呈长方形的,称风腿;挂在锅灶间,经常受到竹叶烟熏烤的,称熏腿;还有为了增加香味,与狗腿一起腌制的,称戌腿。现在金华制作火腿用的最多的是两头乌的猪后腿,此腿体形适中,皮薄骨架小,腿心丰满,是制作火腿的理想原料。

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是个不折不扣的美食家,他出生在火腿之乡兰溪下李村。他在饮食上主张“自然、本色、天成”。他吃火腿不喜花杂的配料,赞成单独蒸煮,以品尝火腿的真味,甚至用以佐茗细嚼,可见李渔是懂享受的人。日常的菜肴中,火腿用得最多的是厨师吊汤,虽说以火腿命名的菜肴多达二三百种,但很多时候火腿只是配角。只有李渔这样的吃法火腿才是主角。

真正会吃火腿的还有鲁迅先生,据说,他是做“清炖火腿”的能手。1929年,他从上海回北平探亲,就亲手做了“清炖火腿”,并对家里人吃火腿“千篇一律总是蒸”的做法感到惋惜。他在北平生活时,常常亲手做“干贝炖火肉”招待朋友。

1924年,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,诗人林长民请他吃饭。宴席上有一道“火腿鸡丝方饺”,深得泰戈尔的喜欢。泰戈尔还专门问起金华火腿的制作,成了中印友谊的一段佳话。

中国古代有两本奇书,一曰《红楼梦》,一曰《金瓶梅》。《红楼梦》里写有关金华火腿的菜肴十多种。“火腿炖肘子”“罗汉跳墙”“火腿鲜笋汤”等,第58回写宝玉爱喝火腿鲜笋汤,喝得太快反被烫着了。第87回中写到“火肉白菜汤”,以火腿提鲜,给病后黛玉提振食欲。这说明火腿在清代是大户人家厨房的必备食材。

□李俏红

唐朝的月灯阁球会

钩 沉

唐朝时期,京城长安有个月灯阁(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等驾坡街道月登阁村,清嘉庆《咸宁县志》改为“月登阁”)本为佛阁,高台建筑。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载:“唐武德年间为月灯阁,建有楼阁供贵族登临观灯赏月。”后来楼阁下建有球场,成为长安球赛之地,每年春天在此举行月灯阁球会。

月灯阁,地处长安曲江池东岸,浐河西岸,唐朝时为游览胜地。唐代诗人王建作诗:“沙湾漾水图新粉,绿野荒阡晕色缯。莫说城南月灯阁,自诸楼看总难胜。”可见此地风光宜人。

按唐朝惯例,经过殿试之后的新科进士,主考部门要为他们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,其中就有马球比赛。《唐代长安词典》载:每年新进士经过吏部主持的考试之后,就在著名球场月灯阁举行球会。

月灯阁球会举行期间,常常吸引着数以千计的长安人士围观,于是就出现《唐诗纵谈》中描述:“幄幕云合,绮罗杂沓,车马骈阗,飘香堕翠,盈满于路”的盛况。

唐代进士放榜时间,一般在正月和二月,而庆祝活动则一般被安排在三月。此时的长安,正值“花卉周环,烟水明媚”时节,人们会走出家门来到城东南的曲江胜地游览,同时还会去月灯阁球场观赛。《辇下岁时记》载:“至清明尚食,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,车马喧闹。新进士则于月灯阁置打毬之宴”。

唐朝晚期,每年春季的月灯阁球会,既可踢足球,也可打马球。球场四周有观看球赛的看台。踢足球,古代称蹙鞠;打马球,古代称击鞠、打球或击球,是一种骑在马上持杖击球的集体性运动。

《玉堂闲语》载:唐懿宗李漼咸通十三年(872年),进士榜未公布时,有人预测,头名状元与最后一名进士,姓中带有“阝”偏旁,名字为二字,后一字在“口”中。

二月,进士榜公布,郑昌图以第一名中进士科状元,邹希回名列榜末。姓名笔画还真应验了。

三月,春暖花开时节,新科进士郑昌图、周繇、韦庠、裴贽、郑延昌、赵崇、张演、邹希回等三十人,集体来到月灯阁,参加球会。

他们打过几场球后,正准备畅饮一番,还未坐定,70多岁的邹希回觉得并未过瘾,请求再打一场,有的进士就说:“彼亦何敢望回!”意思是说,他们怎敢与你邹希回相比呢?(这里引用《论语》,孔子对子贡说:“你和颜回比哪个更强?”子贡答道:“何敢望回?”)在场的都是饱学之士,知是戏言,都笑了起来。

五年后,唐僖宗李儇乾符四年(877年)二月,刘覃、郑賨、邵安石、张昭远、徐延休、薛贻矩等三十人进士及第。《古今谭概》载:乾符四年,新科进士的“曲江春宴”,胜过往年。

《太平广记》载:三月,为了庆祝进士及第,刘覃派人购得数十树樱桃单独摆樱桃宴,大会公卿,当时京城长安御苑中的樱桃初熟,即使是达官贵人,也还没有品尝到,而刘覃将樱桃配以糖和乳酪,让出席的新科进士以及来祝贺的官贵每人食数升,连驾车的马夫也吃了个够。可见刘覃性格上是个豁达豪放之人,有经济实力,也就很任性。在曲江春宴中设“樱桃宴”来庆祝新进士及第,就是从此开始的。后来,樱桃宴亦借指文士雅集。

陕西出土的反映唐代马球运动的“马球图”。

在曲江游宴、樱桃宴后,刘覃与新科进士们兴致勃勃地骑马参加月灯阁球会。

《唐摭言》载:唐僖宗李儇“乾符四年(877年),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,时同年悉集。无何,为两军打毬军将数辈私较于是”。

当时,左、右神策军的打球军将正在球场相互较量,看到新来了一批新科进士,根本就没把这些文化人瞧在眼里。神策军是皇宫的禁军,球场被神策军霸占,拒不让出。

这时,刘覃就对当年的新科进士们高声说道:“我能为大家挫败他们的骄气,一定让他们离去,怎么样?”状元以下的进士们都异口同声表示同意。

于是,刘覃挺身而出,与神策军打球军将(皇城卫戍部队马球队员)一比高低。刘覃操起球杖,跨马上场,风驰电掣一般,抢到球,连续击打球,“诸辈皆喜。覃驰骤击拂,风驱电逝,彼皆谔际。俄策得球子,向空礫之,莫知所在。数辈惭沮,僶俛而去。”比赛中刘覃球技非凡,把军官们赢得服服帖帖。最后,打球军将竟然败在了文人学士的手下,傲气十足的两军打球军将觉得很丢面子,只得低头丧气,惭愧离去。

这年的月灯阁球会,有王公贵族、新科进士、两军将士、士女及数千庶民参与,除了球赛表演以外,还可欣赏杂演百戏、歌舞,并可聚餐畅饮,《怀清堂集》记载:“新进士宴名有月灯打毬。士女咸出,观新进士月灯阁打毬会。”士宦之家便于广场四周搭看棚纵观。

当看到新科进士竟能与左、右神策军高手匹敌,胜了神策军打球军将,赛场周围数千名观众,齐声欢呼,发出雷鸣般喝彩声。以至“时阁下数千人,因之大呼笑,久而方止”。

月灯阁球会,是展示唐朝时期长安球类运动盛况的平台,文化人对体育运动的重视,亦可略见一斑。

□权伦

错错错

“一而再,再而三”,是对某种连续行为的说辞,自然其中也隐含了一些不满。一副对联三字错,一副对联三处错,一句话三事错。这真是错到了事不过三的极致。

先说一副对联三处错。《中国楹联鉴赏辞典》的《作法篇》里录有一联云:

经忏可超生,难道阎王怕和尚?
纸斜能赎命,分明菩萨是脏官。

此联奉劝世人不要迷信佛法广大,本是上乘对联,谁知该联写错三字。“经忏”是什么,怎么个“超生”?其中的“忏”,它是将“谶”(音趁)错写成“忏”。经谶,乃因汉儒以经义图谶之说,附会人事,预言吉凶,而有是称,“谶”,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。而“忏”者,忏悔也。这里有形近致误的问题。原来“忏”字是简化字,其繁体为“懺”,而“懺”的右旁“韱”简化成“千”,故“懺”字的简体便作了“忏”,而“谶”字的左偏旁由“言”字简化成“讠”,而右偏旁的“讖”并未简化,仍作“谶”。而不知底细者,以为“懺”能作“忏”,“谶”也能作“讦”(实际上无此字)也。于是形近致误,将“经谶”作了“经忏”。“纸斜”,讲不通,当为“纸钱”。“脏官”,自然也应是“赃官”。以假设言菩萨是赃官,因其贪赃(纸钱)也。在现今的书籍报刊和电子传媒上,将“赃”字误作“脏”字的,亦非个别,即如赃款、赃官、赃物、分赃、贪赃枉法等的“赃”字。“赃”字,有的亦作“脏”,又将“贝”混淆为“月”。赃者,指盗窃得来的财物和受贿贪污所得。以此论之,“赃”固然脏,但“脏”字,只有污垢、不干净之意,并不包含“脏”的义项。

北京出版社的《中国名联大观》,收录有陕西韩城太史祠一联。太史祠者,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之祠也。而这副对联和注释中却出现三处差错。

一错,联语用字之错。其写联语云:

刚直不阿,留得正气凌宵汉;
幽而发愤,著成信史照尘寰。

“宵汉”,当为“霄汉”。“宵”者,夜也,与“汉”无涉。“霄”者,云也,天空也,“汉”者,天河也。故言正气、志向,常以凌、冲霄汉状之。如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杨子荣打虎上山时的唱段中句“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,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。”写的就是这浩然正气。

二错,司马迁籍贯之错。其注释有云:“司马迁:西汉阳夏(今韩城)人。”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说得明白,“迁生龙门,耕牧河山之阳”,此地在西汉时属夏阳管辖。夏阳,旧县名,春秋时属梁国,战国为魏少梁地,秦改名夏阳,汉置县,属左冯翊(见《汉书·地理志》),故城在今陕西韩城市南。至于“阳夏(jiǎ)”,也是城名。秦为阳夏乡(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吴广即此地人,《史记》有云:“吴广者,阳夏人也。”)汉置阳夏县,地在今河南太康县境。夏阳、阳夏,两地相距千里之遥。与今之陕西岚皋与甘肃皋岚县相仿。

三错,注释之错。将“幽而发愤”解释成“指受宫刑后,忍下屈辱,暗中仇恨。幽,暗。”此种解释不确。《辞源》中就是将此字缩成“幽愤”一词,解释为“郁结于心的仇恨”,亦误。幽而发愤,指的是其受宫刑后。“所以隐忍苟活,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,恨私心中有所不尽,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”故而发愤,乃是指发愤著述之义。发愤,勤奋也。

还有一句话错三事的。广西人民出版社的《黄钟大吕》书中,有王俊义先生的《抚摸汉朝》,文中有句云:“谁也不会像张衡那样一篇《两都赋》就洛阳纸贵。”

一句话错三事。《两都赋》是《西都赋》和《东都赋》的合称,故两都赋是两篇而不是一篇,一错也。张衡所写的是两京赋,即《西京赋》与《东京赋》,这是拟班固的两都赋,即《西都赋》(长安)与《东都赋》(洛阳),二错也。因读者甚众竟使“洛阳纸贵”的,是左思所写的《三都赋》(指三国时的魏都、吴都和蜀都)。此赋写成后,经大文人皇甫秘、张载作注,张华叹为“班(固)张(衡)之流也。”于是富豪之家竟相传写,洛阳为之纸贵。

错错错,且是一而再,再而三,悲夫。

□杨乾坤

语林指瑕

春节习俗之最

相传我国原始社会就有“腊祭”,腊尽春来,人们杀猪宰羊祭祀上天和祖先,祈求来年风调雨顺,人们用朱砂涂脸,鸟翼装饰,又跳又唱。自夏朝起,此习俗流传下来,逐渐形成过大年,即后来的春节(1912年民国成立改年为春节)。春节里有哪些最早的习俗呢?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。

最早的贺年片

贺年片源于汉代的“名刺”。当时没有纸,最早出现的贺年片不是用纸制作的,而是用竹、木削成的,上书名、姓,称为“名刺”。在《燕京岁时记》中记载:“亲者登堂、疏者投刺而已。”刺即贺年片。东汉后用纸代木,叫作名纸。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用红色硬纸做贺年片,称为“红单”,并在贺年片上绘画风光、人物、花鸟等图案。

最早的春联

春联的雏形叫桃符,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把桃符改为春联。据考证最早的春联,是我国五代后蜀主孟昶写的。《宋史·蜀世家》中记载:公元964年,孟昶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词,嫌辛写得不工稳,就自己动手写了一联: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。相传这就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。

最早的压岁钱

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记载:压岁钱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天宝年间。嫔妃们在春日三五结伴做掷钱游戏,为了让她们玩得痛快,宫廷钱库就散些钱给她们。后来此习俗传入民间。

最早贴的“福”字

民间贴“福”字,最早始于姜太公。据说姜太公封神时,封其妻马招娣为穷神,并对她说:“除了有福的地,你都可以去。”从此,老百姓每逢过年过节,家家都贴“福”字,以驱穷神。

□梁国栋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